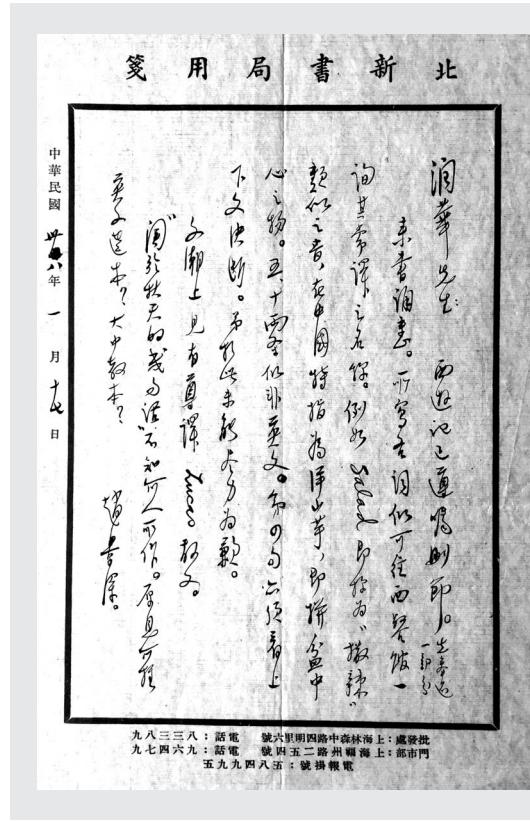


●管继平

■文人尺牍(三十六)

半世成名“牛奶路”

—赵景深致杨润华



从前那一批文人，除了本身就大享“书法家”盛名的如弘一、沈尹默等几位不论，其余虽然不算是书法家，但大多皆擅书，而他们若要细分的话，似仍可分成这样几类：一是曾有相当的书法根底，字也漂亮，如周氏兄弟、刘半农、茅盾、傅雷等；二是只讲性情挥洒，不注重规矩法度的，如辜鸿铭、柳亚子、郁达夫等；而更多的一类，则是介于两者之间，他们往往早年的临池功课也做过，当然志不在此，若仅从其字来看，自然也难见什么汉魏晋唐，或欧颜柳赵，但笔墨的雅致流畅以及文人风度还是有一些的，如赵景深、梁实秋等。这一批文人多生于晚清末年，待他们进学时，大批私塾逐渐转型，新式学校开始兴起，科考已不再是文人士子的唯一出路，书法也不成为读书人的基本“标配”了。

著名学者作家赵景深先生，虽书香人家子弟，曾祖赵亮熙为清代翰林，但他少年时却未入私塾，而是读的教会学校。赵景深五岁时随父亲迁居安徽芜湖，父亲赵锡嘉也有文名，民国初年在芜湖办报纸、编剧本，赵景深就读芜湖圣雅各小学。这是中华圣公会利用清政府庚子赔款所办的学校，也是圣雅各教堂附设的教会学校。该校课程注重的是圣经和英文，所以赵景深从小临池学书的功夫肯定不如学英文的时间多，教会学校的英文底子，为他日后成为翻译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过一套“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笔者搜求不全，但赵景深所著的《海上集》和《文坛忆旧》恰好都有，闲暇翻翻，其中即有赵景深回忆自己求学时期的几个篇什。在圣雅各学校念书时，赵景深就擅长扮演唱戏，那年为了庆祝圣诞，他还正儿八经地化了妆，和同学们在舞台上演了戏，而戏的剧本校方则请他父亲代为编写。虽然那时他才十多岁，但那出话剧却演得非常逼真而成功。赵景深后来能成为戏曲研究家，也许与他儿时的爱好不无关系吧。才学广博的赵景深，于文史、戏曲、翻译、诗歌等多个领域均有建树，然而他并没上过大学，仅读过一个专科，又是严重的专业“不对口”。民国八年，赵景深到天津投奔他在省长公署当秘书的堂叔，入读了南开中学。一年后，堂叔家道中落，他无力继续求学，虽爱好文学，但迫于生计，就去报考了天津棉业专门学校。因为入该校读书不必支付学费，也免收膳宿费，此条件是他报考的最大诱因。进棉业学校须考代数几何，由于他没有学过，只得请与他年龄相仿的小姑母帮忙补课，临阵磨枪，孤注一掷。报考者人数有千余人之众，待发榜时，赵景深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去看榜，他从榜尾向前看起，过半后仍未看到自己的名字，不禁有点心慌意乱了，因为考不取即面临失业，压力甚大。当看到最后已觉了无希望时，却料瞥见自己的名字居然出现在最优等的第四名上。他压住狂跳的心，定了定神再看，果然没错！于是，高兴地回家，将自己平日所爱的童话小说书籍统统送了人，立志专研棉纺业，以后就吃纺织的饭了。

其实，人生路途的曲里拐弯中，存在着很多偶然，有时事与愿违，有时又歧路重回。赵景深当年在南开中学时，曾听过徐志摩两堂课。徐志摩在课堂上让同学翻译一句话，结果赵景深译得最佳，受到徐的奖赏。课后徐志摩问赵景深，将来是否以文学为业？赵景深说“是”，徐志摩说不行，并认为文学只能当副业。所以，赵景深在棉业学校念书时，把文学又当成了“副业”，暇时则翻译一些他喜欢的童话和小说。他课余时向上海《妇女杂志》和天津《新民意报》投稿，随着见报次数增多，赵景深之名逐渐也受到了同行的关注。同道主动联系他合作，他们三个青年与《益世报》接洽，联手承揽了该报副刊《新知识》的编撰工作，每月还可分得二十元报酬。又因向郑振铎编的《儿童世界》《文学旬刊》投稿，

而受郑之赏识，并介绍他加入了文学研究会。由于翻译写稿的活儿增多，在棉业学校的功课则日渐下滑，至毕业考时，赵景深的成绩已降到了第三十六名，结果被派到待遇差而地方偏远的纱厂服务，每月薪酬仅八元大洋。他心想：我客串编辑刊也能挣二十元了，何必再去纱厂辛苦？于是，他索性告别了棉纺专业，从此，真正走上了报刊编辑和文学翻译创作之路。一九二四年，赵景深翻译了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火绒匣》《白鹤》等，陆续在商务印书馆的《少年杂志》上发表，许多年后我们再回头来看，赵景深可能就是最早把安徒生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翻译家了。仅凭此一点，他也可名载文坛，当年抛去了棉纺专业并不足惜矣……

数年前，笔者有幸，辗转求得赵景深手札一通，此函写在北新书局的专用笺纸上，时间为“民国卅八年一月十七日”。赵景深一九二五年自天津来到上海，先后在上海大学和开明书店任职，后受北新书局李小峰的盛邀，于一九三〇年到北新书局任总编辑，其时赵景深的夫人马芝宝年前因病去世，小峰作伐，将妹妹李希同许配给了赵景深，好友又成了妹夫，关系更是不同一般。当年北新书局在福州路河南路口还有个门市部，如今则是一家万康药房了。赵景深在北新任总编直至一九五一年，此函为一九四九年所书，正在北新任职，且看内容如下。

润华先生：(西游记已遵嘱删节。先奉一部分)

来书诵悉。所写各词似可往西餐馆一询其常译之名称，例如 salad 即称为“撒辣”类似之音，在中国特指为“洋山芋”，即拼盆中心之物。五、十两条似非英文。第四句亦须看下文决断。弟于此未能尽力为歉。

《文潮》上见有尊译 lucao 散文。

“关于秋天的几句话”不知何人所作，原见何种英文选本？大中教本？

赵景深

正如文前所述，赵景深的字非常雅致流畅，他们这

一批像梁实秋、施蛰存等，都具有同样特性；在书法上对汉魏晋唐的碑帖多有浸染，运笔自如，但并不拘泥于传承某家某派的书风，下笔温润秀雅，带有书卷气。我曾见过赵景深先生书写的条幅，录写自己旧时的诗作，也是随意的挥写，如小字放大，并不太讲究书法的用笔或章法。此件写给“润华先生”的信札，完整一页，字迹非常的劲健灵动，清晰悦目。难怪当年赵景深的“曲友”、开明书店的徐调孚说：“赵景深的字，喜用青莲墨色书写，摇曳多姿，似出闺秀之手。”这一书札也是，用笔极细，不经意看还以为是硬笔所书，非得经手了原件方知乃为毛笔书，此应该是过去人用来写稿写信的细笔，且写在宣纸的信笺上，而不是洋纸。我们知道，若用硬笔，是无法在宣纸上流畅书写的。书信的内容主要是回复润华先生关于几个英文单词的译法问题，“润华先生”姓杨，估计是年轻辈的编辑同道，也从事文学翻译，故常常向赵先生请益。

我在其他拍卖图片中还发现一封赵景深先生致杨润华的书信，与我所藏的这封信在时间上仅相差三个月，内容也是请教翻译中遇到的难解英文词句。我把内容录下，正好可对同读。

润华先生：

宁波学生刊物索弟稿，谨附奉“关于屈原的戏剧”，此稿在内地刊出，外间不曾见过。可否请抄一遍再寄去，乞酌。

我对英文实在不行得很，完全是自学出来的。囑译二词，题目拟译为“就业勿忘布道”，词语拟译为“整个时间的布道工作”，未知有当否？此二词未看上下文，亦仅断章取义，容有错误也。

赵景深 三八、四，廿九

尽管赵景深当时已是有名的翻译家了，又在复旦大学任教授，但他依然很谦虚，说自己的“英文实在不行得很，完全是自学出来的”，这一半缘于他性格的低调，一半也是实话，因为他的英语基础，主要得自他少年时就读的教会学校，其后确是全靠自学了。说起翻译，赵景深最被人所不忘的故事（其实也可以算“事故”了），就是被鲁迅嘲弄出一个“牛奶路”的典故。那是一九三〇年前后，鲁迅与梁实秋有一场关于文学的阶级性以及“硬译”的争论。正好赵景深那时也写了一篇《论翻译》的文章，主张“与其信儿不顺，不如顺而不信”，这正好与鲁迅的“硬译”观点相左。于是鲁迅发表了一篇《马牛风》，在赵景深翻译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中，找出他将银河(Milky-Way)望文生义，译成了“牛奶路”，而将神话中的“半人半马怪”(Entaur)译为“半人半牛怪”的错误，进行了嘲讽。后来鲁迅写了一组打油诗《教授杂咏》，共四首五言绝句，分别嘲弄了钱玄同、赵景深、章衣萍、谢六逸四人，非常幽默有趣。其中写赵景深的四句是：“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讽刺赵教授“遇马发昏，爱牛成性”，意即本来是“马”的，却被“牛”了一下，本来是“银河”，却成了“牛奶路”，以至于乌鹊看了也不敢过来搭桥了。

不过赵景深对鲁迅的批评是基本接受的，他们的关系并不像文章嘲讽得那样坏，鲁迅之前还参加过赵景深与李希同的婚礼，赵景深在北新书局也多次编发出版鲁迅的著作。而且赵景深对鲁迅的小说以及小说史研究十分倾慕，多次撰文颂扬，这想必鲁迅也是知道的。只是鲁迅这个人下笔比较尖刻，讥刺起来不留情面，加之他名声大，影响广，文章也更漂亮，所以被他骂过的人，如梁实秋的“泛走狗”，施蛰存的“洋场恶少”，以及赵景深的这个“牛奶路”，虽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仍时常被文坛津津乐道，不知不觉地，他们也就随“青史”一同被“留名”了。

3月4日下午，笔者有幸参加了上海书协举办的“2017年度总结表彰大会暨戊戌新春茶话会”，两百余名单新老会员欢聚一堂，见证了上海书协一年来取得的可喜成果，共叙友情，共贺新春，共期未来。

的确，这一年上海书协对外影响力在扩大，很多工作可圈可点。比如，全国第十一届书学讨论会在上海召开；“正大气象”纪念胡问遂诞辰100周年国际书法大展在中华艺术宫举行；有着创新性的上海书法名家书写结婚纪念证书活动；上海春联大会；上海市首届篆刻艺术展；修养之旅——上海书法家诗书画印作品展等都受到了社会关注，如果要评出上海书坛一年来的“十大亮点”的话，这些都可以列入其中。

不过，在“年会”上可能最为拨动心弦的还是重奖第六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的获奖作者。此次“兰亭奖”上海有三位获奖，一位入展，书协官微也发出喜报：厉害了！上海市获奖人数全国第一。他们是：王晓光、水赉佑、王玺、张卫东。其中王晓光、水赉佑二位在金奖空缺下，包揽了书法理论银奖；王玺在仅有6个书法篆刻铜奖名额中靠着自身的实力打进其中。对四位作者笔者认识其中三位，水赉佑老师虽未谋面，但早已知道他是一位资深专家学者，书论著作颇丰。水赉佑先生曾获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三等奖”，第四届全国书学讨论会“一等奖”。两年前，笔者曾在一家媒体上拜读过一篇文章《崇兰堂里的细读书》，简略介绍了水先生的成果及点滴新闻。“崇兰堂”是他的书斋名，是顾廷龙先生为他题写的。据悉，顾先生非常关心、鼓励他对《兰亭序》的研究，故题为“崇兰堂”，“兰”者，《兰亭序》也。今年，水赉佑先生已76岁了，他退休多年一致没有停留对中国书法的研究，而且，始终保持着一颗执着之心、平常之心。他在杨浦图书馆讲座时，有两句幽默的话至今让人记忆，他因为长期从事图书资料室工作，说自己对书法研究是“业余爱好”，还有一句就是“傻瓜人做傻瓜事”。水先生总是那么谦逊，难怪德国哲学家尼采曾言“谦逊基于力量”这是有道理的。

对王晓光，笔者是在去年9月认识的并加了微信。那天，他到我们郊区嘉定来参加桃李园实验学校教师节活动，他的老乡，该校老师昭文兄一致向笔者夸赞他，他是上海《书法研究》引进的人才，现在是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从那时起笔者就对王晓光有了深刻印象，也时时在关注着他的学术动态。他是一位低调的人，虽然已是蝉联三届“兰亭奖”二等奖（银奖）的作者，但我们很少看到他像某些人那样“张扬”，自称什么什么家，装腔作势。这几年，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学术指向，将简牍书法研究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出版了“简牍书法研究三部曲”：《秦简牍书法研究》《新出汉晋简牍及书刻研究》《秦汉简牍具名与书手研究》，据专家评价：王晓光的学术课题填补了该领域学术研究的空白。

对王玺，笔者是在全国第十一届书法篆刻展上认识的，当时他荣获了书法“全国奖”，上海书协也专门组织了部分作者到北京中国美术馆观看十一届“国展”，笔者受令作为带队者一行进京观展。回来后，我们每个人都撰写了自己的观展感想，记得王玺就“国展”书法获奖作品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获奖作品作为所有入展作品的代表，诠释了书协展览新的审美取向与评审理念，值得我们思考。”这“思考”就寓意深长了，或许是批评，或许是鞭策。再看看他在此届“兰亭奖”获奖的创作感言，他说：近年来，我常思考一个问题，作为年轻的书法工作者，我该做些什么？自古以来，古人对读书人早就已有过要求，《大学》中说到，修身、齐家、平天下。我的父亲常教诲我两句话：“治学来不得半点虚假”，“做人心中要有他人，多做好事，多做善事”。从王玺的感想到感言，从学书到做人，笔者隐隐感到他在从另一个视角告诉大家“学书法”与“做人”有着必然的联系。

对张卫东，笔者就更熟悉了。笔者与卫东兄曾是战友，都在当年的空军政治学院学习、工作、创作。此次“年会”，可能大家听的最多的是前三位，目睹到的也是前三位的特写形象，但是，笔者觉得在这里也应该提到他，因为“兰亭奖”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奖，能够入展就不容易。卫东兄也是三次入展“兰亭奖”的作者，有时，笔者开玩笑的说：卫东是一位始终坚守阵地的“战士”，一位以“集结号”为令的“战士”。这里，就算笔者插播了一个“广告”吧！

扯到“兰亭奖”，真的又让笔者想起去年撰写的那篇拙文《兰亭：想说爱你不容易》：“你是那昨天的云，还是今天淋漓的雨……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那需要太多的勇气，想说忘记你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我只有矗立在风中，想你！”在这里，笔者想再次向四位作者深表祝贺！续写“兰亭”精神，就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

“年会”结束了！在临近尾声时，有人对笔者说：这次“年会”很热闹！笔者以为，“热闹”也是好事，说明大家精神爽，愉快了，“矛盾”就少了，事情就好做了。笔者前面所言“共期未来”就在于此，我们期盼上海书坛的新气象、新作为，期盼上海书坛的美好未来！

海上造笔者：周虎臣(九)

情凝笔端 誉满管城

海许多商店招牌都出自这支楂笔。胡老用得称心，写秃之后，十分惋惜不舍。胡老家离笔庄不远，是笔庄之常客，与制笔师傅也十分稔熟。为此他特地去书店，找到制笔师傅吴陵安，他说：“我有支楂笔，用久了笔头有点秃，想把秃毛换掉，加入新的锋颖，使旧笔如初，不知行不行？”吴师傅一口应允。

周末休息天，吴陵安师傅带着水盆等制笔工具，来到胡家。胡老见特级技师登门服务，欣喜万分。吴师傅将胡老的楂笔笔头打开，又拆了一支新的楂笔，取出笔尖新的锋颖，添到旧笔中。经过拆、拼、梳、理、扎等工序，再把旧如新的笔头重新装入原来的红木笔斗之中，再注上胶漆，足足忙碌半天。临走时他告知胡老等七天之后再用。一星期后，胡老蘸墨试笔，感觉果然如同原笔新时一样，非常得心应手，十分高兴。次日一清早，胡老特地赶到周虎臣笔庄，向吴师傅道谢。

吴凌安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周虎臣笔庄的制笔高手，他的水盆技艺绝对一流，制成的笔头，笔形美、弹性足，使转灵活。那时没有全国性的大师评选，而他的技艺众口皆碑。从此周虎臣为满足书画家的需求，开设了“旧笔新做”的业务，整修一支旧笔比做一批新笔还要麻烦。一般制笔人宁做一批新笔，也不愿单修一支旧笔。修笔不仅要有高超技艺，更要有一颗热忱细致的心，都是安排像吴凌安这样的制笔高手担任。

胡夫人说罢，将这一直珍藏的楂笔捐赠给了上海笔墨博物馆。此事虽已过去几十年，胡老、吴师傅虽已仙逝，而这支凝聚着书坛名家与大国工匠深情厚谊的楂笔，如今陈列在博物馆“名人名笔”展区，楂笔上面镌刻的“顶号黑棕楂笔——老

的论述，在书坛教育方面引起了很大反响。为了便

于有志于行书的爱好者的学习，1994年前后，上海教育出版社提请胡老写一本行书字帖。接受邀约后，胡老首先想到必须准备几支好笔，以利于充分体现出行书中传统的笔法和结字，展示其行书风格、气韵，于是找到了周虎臣笔庄。周虎臣承接了胡老的定制，根据字帖的大小要求，反复调整了羊毫与狼毫的比例和配方，并对笔头的圆径、出锋、笔杆都做了调整，直到胡老试用感到满意为止。后来此笔辅助胡老完成了他的得意之作《胡问遂行书字帖》，并正式定名为“胡问遂选颖”。

二十多年过去了，沈老和胡老两位书坛前辈也先后驾鹤西去，这两支笔也被请进“上海笔墨博物馆”陈列，工作人员常会向参观者讲述当年难忘的故事。周虎臣现在也还按此样不断地生产销售，满足学习沈尹默、胡问遂字体的书者用笔之需，为广大书法爱好者服务。

试笔赠言，深寄厚望

现代书画名家重视好笔好墨，如同历代沙场名将重视良驹宝刀是一样的道理。作为笔墨老字号，感到不仅应该满足书画名家的各种需求，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够帮企业出点子，为产品把质量关。譬如，试制新笔时，如何确定笔毛的配比，笔径的粗细，出锋的长短等都有许多讲究，制笔师傅有时会有新的设计，但是是否适应书者使用、能否被市场认同？若不经试用即大批投产，一旦失利常会滞销变成库存，因而在批量投产前需慎之又慎。为难之际，周虎臣首先想到的就是请书画名家帮忙过关。新产品一定要让名家试过，听取意见后再改

进，再使用，直到他们满意为止，这已是周虎臣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尽管书画家有时意见也会不同，甚至相左，但是多数书画家认同的笔墨，市场也一定欢迎。民国时期，周虎臣就曾请李瑞清、王一亭、吴昌硕、张大千、吴湖帆、沈尹默等书画名家把关，不仅为他们定制笔，还请他们为新笔试用提意见。新中国成立后，谢稚柳、李天马、白蕉、唐云、胡问遂、任政、黄胄、吴青霞、程十发、林曦明等也都是周虎臣的座上宾。

1961年，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在上海成立，积极倡导对优秀书法名帖的学习，包括对沈尹默的字帖和沈尹默书法理论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大地春暖，书法热掀起，门店销售中人们对狼毫的需求不断增加。周虎臣领导不由想到原来“尹默选颖”的定制笔，能否增加供应，形成大、中、小系列呢？而原笔加粗加长（如大号），或收小变短（如小号）之后，能否依旧保持原型（中号）的品质呢？制笔师傅与领导对此都有点忐忑。此时，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胡老。因胡老是沈尹默的得意弟子，一定熟知“尹默选颖”之特性。可是，此时胡老已经是大名家了，肯帮这个忙吗？没想到胡老知道这个要求后，马上答应。经过几次往返，几番改进，终于得到了胡老的首肯。在1981年6月5日，胡老曾挥笔致函厂领导，评价豹狼毫1-3号笔“弹性适中，使用时圆转如意，有得心应手之妙，诚为笔中佳品”。充分肯定了这个系列的试制成功。沈尹默的定制笔，就这样化成了能够为广大书法爱好者服务的“豹狼毫”大中小系列。

“周虎臣”在制笔行业的兴盛，完全在于它深深扎根于书画家提供的个性化服务之中。毛笔自古就有“尖、齐、圆、健”的要求，史称“四德”。当一个书画家的艺术发展到巅峰水平时，必然会对“四德”做出自己的诠释，并对“四德”提出新的要求。服务的过程，满足的过程也是“周虎臣”在工艺技术上不断突破和提高的过程。胡老曾为周虎臣题词：“尖齐圆齐，誉满管城”，周虎臣的老法师至今仍记得胡老当年的音容笑貌，年轻一代周虎臣人也不会忘记对他中华老字号的深切关怀和殷切厚望。

杨祖柏
简斋闲语